

国内外幸福问题研究进展梳理

孙美平¹,姚晓军^{1,2},张明军¹,何伟¹

(1.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兰州730070;2.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幸福是人感知自己需要、活动和条件相对和谐的生活状态,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文章在基于学科背景、影响因素等视角对国外幸福问题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系统的梳理。相比之下,我国对幸福问题的研究正处于不断探索阶段。此外,文章还指出当前有关幸福研究存在的根本性、固有性问题和我国对幸福研究的诸多不足。

【关键词】幸福问题,研究进展,梳理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768(2012)09-0009-0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也涌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环境问题,如贫富不均、犯罪率上升、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因而,就个人感受而言,人们并没有随着个人或家庭经济收入提高而感到自身幸福感有所提升。人类的幸福感究竟与哪些因素有关,如何有效地提升个人幸福感这一命题已成为全世界各领域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本文以幸福问题作为研究探讨的对象,通过对幸福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的详细梳理,力图把握幸福问题的历史研究脉络和借鉴国外研究的先进成果,为构建新时期我国和谐社会伟大事业提供科学参考。

一、相关幸福问题研究的文献梳理

(一)国外幸福问题研究的梳理

国外关于幸福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最初兴起的导因与人们对经济腾飞、现代化的反思密切相关。自“幸福问题”一词被正式关注以来,国外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从自身学科的角度对幸福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并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其中以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界对幸福问题的研究最为突出、最具影响力。

1.基于学科背景的幸福问题探讨

(1)幸福问题的经济学探讨。传统经济学对幸福的理解基于“越多越好”理论^[1],等价于边沁功利主义将幸福简约为效用的观点。它借用经济学中的偏好理论来刻画人类行为,隐含的观点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增加消费,从而提高满意度。因此,在公共政策的导向上,就有了“提高全社会的收入水平以增进社会福利”的论点。早在1932年,庇古就提出“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福利水平的变化将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也朝同一趋势发生变化。”然而,一些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Galbraith^[2]在他1958年所著的《丰裕社会》一书中提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消费,而是生活的效益和享受。”美国经济学家Easterlin^[3]认为“经济增长等因素对福利的影响,也并不一定是

越多越好”,并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幸福》中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收入和幸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澳大利亚经济学家Yew Ywang Ng^[4]在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幸福不足”现象研究后证实了“幸福鸿沟”的存在,并提出“幸福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幸福与健康、工作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en^[5]从幸福的反面——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幸福进行了分析,提出贫困导致不幸福的根本原因在于穷人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而经济发展也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幸福的改善。

(2)幸福问题的心理学探讨。心理学领域研究的幸福又被称为主观幸福。心理学中关于幸福的研究主要基于“定值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会积极适应现状,每个人都有由基因、个性所设定的幸福值,客观条件的改变对个体的满意度而言并无太大的作用。如果定值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公共政策的目标旨在增进人们幸福的努力便是徒劳的,而且任何个体也都无法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Brickman^[6]等人的研究认为遭受重大意外事故,如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并没有预期的那样不幸福,彩票中奖者也没有想象的那样幸福,这一理论是基于对定值理论的支持,但这项研究的局限是样本太小,仅有29个受害者样本和22个彩票中奖者样本。Mehnert^[7]等人对675个残疾人的调查则推翻了Brickman的结论,其研究证实,如果受害者的健康状况恶化,将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长期负面的影响。另外Blanchflower^[8]的研究也表明在大多数社会经济条件下,Mehnert的结论是成立的。美国心理学家Diener^[9]对影响幸福感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作了区分,研究发现外部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小。

(3)幸福问题的社会学探讨。社会学对于幸福的解释不同于其它学科,与一般意义上将幸福作为某种纯粹个人现象或者心理现象不同,社会学的幸福是一种大众幸福,倾向于将幸福看作一种社会产物。在社会学领域,荷兰社会学家Veenhoven对

【收稿日期】2011-12-12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0701-24),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NWNNUHXYKYXM-2009-3)

【作者简介】孙美平(1982-),女,辽宁沈阳人,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计量地理、生态经济;姚晓军(1980-),男,山西夏县人,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讲师,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计量地理、生态经济;张明军(1975-),男,甘肃宁县人,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生态经济;何伟(1985-),男,山西大同人,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环境、产业开发。

幸福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总能提出新的理论与假设,并将自己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1984年他建立了世界幸福数据库^[10],该数据库涵盖了不同学科关于幸福的研究成果以及世界范围内国家层面上的幸福调查数据,这为幸福的综合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2004年Veenhoven^[11]用2×2列连表通过区分生活质量的4种类型对幸福概念进行了深入系统地分析,认为幸福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而且对幸福的评价应基于持久的时间,短时的心境不会影响幸福。“幸福生活年(Happy-Life-Years, HLY)”的概念^[11]也是Veenhoven建立在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它由人们的幸福指数与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相乘而得,表示一个区域人们幸福生活有多长久。基于这一概念,他比较了1995—2005年期间95个国家的幸福水平^[10],结果表明,瑞士最高(63.9)、津巴布韦最低(11.5),中国处于中等水平(44.3)。

(4)小结。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心理学主要从影响幸福的内部因素(人格特性)进行研究,而经济学多从影响幸福的外部因素(客观条件)加以分析,社会学则强调应把幸福置于社会环境中研究。Easterlin^[12]在对这些研究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单从主、客观因素的任一方面都难以全面地了解幸福的本质,幸福应是主观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这一认识,他将影响幸福的内、外部因素相结合,把生活的方方面面看作一个整体来考虑,构建了比心理学的“定值理论”或传统经济学中的“越来越好”理论更完善的“满意度”理论。

2. 基于影响因素的幸福问题探讨

影响幸福问题的因素涉及到与人类生活需要、活动条件有关的各个方面。国外学者多数基于收入多少、年龄大小、婚姻状况等角度对幸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有部分学者还将影响个人幸福的因素扩展到性别、失业、社会公平、文化教育、生态环境、气候条件等。

(1)基于收入因子的幸福问题探讨。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当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时,个体幸福感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程度的提高。Easterlin从横断面关系^[13]和生命周期模式^[14]对收入和幸福的关系进行了系列研究,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某一个时刻,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显著,但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收入与幸福间关系并不明显,并且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并不能增加所有人的幸福。Manfred^[15]对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和荷兰5个国家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和人均GDP关系进行分析,发现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ISEW随着人均GDP的增加提高,之后人均GDP持续增加,而ISEW开始呈下降趋势,即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Diener^[16]对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人们收入与幸福关系的跟踪研究表明,尽管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在最近50年有了迅猛增长,但是幸福水平却没有多大提升。但是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则对这种结论提出了挑战,Veenhoven^[17]发现,在较为贫穷国家,个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如果以1~10来标度幸福感,从1946—2004年美国人们幸福感平均只提升了0.006,而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人们幸福感增幅很大,如韩国提升2.18,巴西增加1.46。这一结论同样被Hayo^[18]在对东欧一些转型国家的研究中所验证。

(2)基于年龄因子的幸福问题探讨。幸福与年龄的关系较为复杂。Blanchflower^[8]对近20年来美国和英国不同人群的幸福水平进行研究发现,幸福随年龄的增长呈现U型曲线,在其它变量保持不变情况下,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幸福感都在40岁左右时达到最低。Gerdtham Johannesson^[19]的研究也表明幸福与年龄呈“U”型关系,且最低点在45~64岁之间。Wilson^[20]提出“具有幸福感的人应该是年轻的。”Theodossiou^[21]研究结果表明相对年

轻人和老年人幸福感而言,中年人幸福感最低。Easterlin^[22]在对美国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后,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18岁至中年期间人们幸福感缓慢提升,过了中年之后幸福感缓慢下降,并认为呈现这种模式的原因是人们在不同时期对生活领域满意度不同。具体而言,中年之前幸福感上升主要是由于对家庭生活和工作的满意度在持续增加,中年之后幸福感开始下降,不仅是因为身体健康满意度在下降,而且家庭状况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也都在下降。

(3)基于婚姻因子的幸福问题探讨。婚姻生活往往被人们视为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Campbell^[23]将婚姻和家庭视为预测美国人总体幸福感15个因素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在他看来,由于配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婚姻因素会有助于提高幸福感水平。Stutzer^[24]认为较幸福的个体倾向于选择结婚,而且夫妻双方从婚姻中得到的幸福感有较大差异,并且由于劳动力分工的不同,女性和新组建的家庭往往幸福感更高。Diener^[25]的研究也表明婚姻状况与幸福水平呈正相关,已婚者相比单身、离婚、分居或者寡妇(鳏夫)有较强的幸福感。Blanchflower^[8]用量经济学方法试图从离婚角度确定幸福或痛苦的价值,计算出和睦的婚姻给人们带来的幸福价值大约为10万美元/年,那些已婚、受过高等教育以及父母没有离异的女士幸福感最高,再婚的幸福感次之,失业的幸福感最低。Argyle^[26]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婚姻增强幸福的原因给予了两点解释,即婚姻能够减轻个人生活的压力,也能减少个体生活的孤独感。不过近年来美国已婚者与未婚者之间的幸福差异在逐渐缩小,Stutzer^[24]认为在美国出现的这种变化应当归因于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和未婚同居现象的增多。

(4)基于其他因子的幸福问题探讨。除以上三个方面外,学者们还从性别、失业、社会公平、文化教育、生态环境、气候等因子分析了其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Lu等^[27]使用中国人幸福感量表随机选取了600位年龄在18~65岁之间的高雄市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性别和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已婚者和高收入人群更幸福。Theodossiou^[22]从失业和精神压力之间关系对1992年英国家庭的幸福感进行研究,发现失业人员感到不幸福,而且男性受到失业的影响要比女性大。Van Praag^[28]从生活领域的6个方面解读了德国人的幸福感,认为总体生活满意度可由工作满意度、经济满意度、住房满意度、健康满意度、闲暇满意度和环境状况满意度6部分组成。并计算出经济、健康和工作领域的满意度是影响德国人幸福感的三个决定因素。Alberto等^[29]使用123668份问卷调查了社会收入不平等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在欧洲和美国国家公平和幸福之间都具有密切的正向关系,尤为表现在欧洲国家的穷人对不平等更为关注。除此之外,部分学者还对人们幸福与环境、气候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探讨。Rehdanz和Maddison^[30]对67个国家的气候与幸福关系作了分析,发现温度、降水等气候变量能够用来解释幸福的差异。气候变化可能会极大地改变国家间幸福的分配,因为那些高纬度国家可能会从温度变化中获得收益,而那些夏季高温的国家最有可能遭受气候变化的损失。Ferrer-i- Carbonell和Gowdy^[31]运用有序概率模型对英国人的主观幸福与其对臭氧空洞、物种灭绝的态度关系作了检验。结论显示两者态度对幸福的影响刚好相反,人们对物种灭绝的关注对个体的幸福感呈正面影响,而对臭氧空洞的关注则呈负面影响。Welsch^[32]采用幸福研究方法对西欧10个国家1990—1997年改善空气质量的值进行了评估,计算结果显示,减少空气中二氧化氮含量每年每人需支付750美元,而减少铅的含量每年每人需支付1440美元。

(二)国内幸福问题研究的梳理

相对于国外对幸福问题的大量研究,幸福问题在我国的研究则较为滞后,正处于不断探索阶段。我国学者对幸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心理学领域大多侧重于国外的理论介绍,通常从个体心理健康方面进行研究,以邢占军^[33-34]、黄立清^[35]、辛自强^[36]、池丽萍^[37]、吴明霞^[38]等人为代表,其中邢占军从10个维度编制的中国人幸福感受量表是该领域较具影响的研究之一。经济学领域多从国家政策目标,对收入与幸福关系进行研究。陈惠雄^[39]、傅红春^[40]、赵奉军^[41]、曾飞^[42]等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对幸福研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陈惠雄对传统经济学所奉行的效益最大化提出了质疑,认为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趋乐避苦”的幸福最大化,因而提出了以幸福原则来衡量社会运行绩效。傅红春通过抽样调查对上海居民收入满足度低的原因给予了三点解释,一是房价高、二是教育费用高、三是就业压力大。赵奉军从相对收入理论,曾飞从社会比较理论、适应水平理论分别对收入与幸福关系作了经济学解释。

除以上两个领域对幸福研究外,近年来其他学科对幸福的研究也相继展开。程国栋^[43]从国家核算体系的演变和特点入手,对中国人文发展的理论内涵和人文发展面临的环境和社会压力作了深入分析后,提出“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是近期最具影响的研究之一。李卫平^[44]运用文献资料、理论分析法对北京2008奥运会的申办与北京市民幸福指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奥运会的举办不但能促进北京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还会提升北京市民的幸福感。张明军^[45]通过发放调查问卷,采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对与幸福感有相关关系的变量进行组群差异分析,认为兰州市居民幸福感与性别、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职业稳定、家庭关系等因素显著相关。

二、结语与展望

尽管幸福研究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热潮,但在发展与完善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如幸福感究竟包括哪些成分,幸福感从哪里来等等。这就要求我们要从更深层次上来探讨幸福感的本质和影响因素。由于幸福感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它既包含了一个人的理智判断,也包含了一个人的情感成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幸福感是主观的,要把主观性很强的心理态度作为一种客观指标是测量幸福的最大难题。除此之外,对比国外研究成果,我国幸福问题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如对幸福的理论体系把握不够,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统计测评不够科学,如分析收入和幸福关系时,没有考虑到收入的分布、边际收入、其他变量对收入的影响等方面,而这些因素对于幸福水平的影响非常大,在进行社会调查时,设计的问卷内容往往不一致,研究者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需要任意地选择指标,没有形成统一的问卷格式,这样使得研究结果不具有可比性。总体来看,关于幸福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以上诸多问题需要亟待系统和全面研究。

【参考文献】

[1] Frank R.H. Microeconomics and Behavior[M]. McGraw-Hill, 2002.
[2] Galbraith J.K. The Affluent Society[M].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8.
[3] Easterlin R.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M]. New York: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Academic Press, 1974.
[4] Yew Kwang Ng. The East-Asian Happiness Gap: Speculating 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0, 7(1): 51-63.
[5] Sen A.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6] Brickman P., Coates D., Janoff-Bulman R. Lottery winners and accident victims: Is happiness relativ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8, 36(8): 917-927.
[7] Mehnert T., Krauss H.H., Nadler R., et al. Correlates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those with disabling conditions[J].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 1990(35): 3-17.
[8] Blanchflower D., Oswald A.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88): 1359-1386.
[9] Diener E.S., Oishi S. Recent finding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J]. Ind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997(24): 25-41.
[10] Erasmus Universiteit Rotterdam. 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 [J/OL]. 2010-12-12. <http://worlddatabaseofhappiness.eur.nl/>.
[11] Veenhoven R. Happy life years [C].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Operationalization of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Thimphu, Bhutan, 2004: 287-318.
[12] Easterlin R.A. Building a better theory of well-being [R]. IZA Discussion Papers 742,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2003.
[13] Easterlin R.A.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5(27): 35-47.
[14] Easterlin R.A. Life cycle welfare: evidence and conjecture [J].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1, 30: 31-61.
[15] Manfred M.N. Economic growth and quality of life: a threshold hypothesi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5(15): 115-118.
[16] Diener E., Suh E., Lucas R., et al. Subject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
[17] Veenhoven R., Hagerty M. Rising happiness in nations 1946-2004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6(79): 421-436.
[18] Hayo B. Happiness in transi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Eastern Europe [J]. Economic Systems, 2007, 31(2): 204-221.
[19] Gerdtham U.G., Johannesson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health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results based on Swedish microdata [J].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1(30): 553-557.
[20] Wilson W. 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7(1): 67.
[21] Theodossiou I. The effects of low-pay and unemployment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logistic regression approach [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98(17): 85-104.
[22] Easterlin R.A. Life cycle happiness and its sources: Intersections of psychology, economics and demography [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6(27): 463-482.
[23] Campbell A., Coover P.E., Rodgers W.L.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6.
[24] Stutzer A., Frey B.S. Does marriage make people happy, or do happy people get married? [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6(35): 326-347.
[25] Diener E., Biswas-Diener R. New direction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earch: The cutting edge [J]. Ind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0(27): 21-33.
[26] Argyle M. 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 (2nd Edition) [M]. London: Methuen, 2001.
[27] Lu L., Shih J.B., Lin Y.Y., et al.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correlates of happiness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7, 23(3): 453-462.
[28] Van Praag B.M.S., Frijters P., Ferrer-i- Carbonell A. The anatom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3(51): 29-49.
[29] Alberto A., Rafael D.T., Robert M.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9-10): 2009-2042.
[30] Rehdanz K., Maddison D. Climate and happines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5, 52(1): 111-125.
[31] Ferrer-i- Carbonell A., Gowdy G.M.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happines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0(3): 509-516.

(下转第31页)

的显著性水平),而拒绝PPI成为GDP原因的概率大于拒绝CPI成为GDP原因的概率,这说明CPI变动对GDP的影响要大于PPI变动的影 响,但两者的影响都不大。而假设GDP不是成为PPI和CPI的原因的检验值都大于临界值(1%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GDP的变动对CPI与PPI的变动有很大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总体上我国GDP的变化要领先于CPI与PPI的变化,CPI与PPI变动对GDP变动的影 响较小,GDP变动对CPI与PPI变动的影 响较大,这与前面的分析结论相一致。即我国经济周期领先于物价周期,物价变动受到经济产出水平影 响较大,而对与物价指数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居民消费品价格对产出的影 响大于工业品价格的影 响,这说明消费价格变动更容易影 响总需求的变化进而对产出造成影 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第一,从1978—2007年间,我国经济周期大体上领先于物价周期,物价波动受到产出波动较大的影 响,这说明了我国经济周期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外部供给方面的冲击而不是内部需求的冲击,因此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外因论”对我国实际经济运行更有解释力。

第二,在最近的经济周期中物价变动与产出变动出现了不一致,这表明我国经济周期的产生受到除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因素的影 响外有其他因素的影 响。

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物价周期波动幅度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局面,这表明我国宏观调控在稳定物价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二)建议

第一,继续推进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完善市场配置资源职能,发挥市场经济制度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第二,鼓励企业创新,加大科技研发费用,推动技术创新步伐,为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

第三,继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鼓励高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

第四,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改变过去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五,提高居民收入,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优化当前的投资消费结构,促进今后我国的经济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吴江.论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J].商业时代,2008(15):7-8.
- [2] 汤铎铎.从西斯蒙第到普雷斯科特——经济周期理论200年[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8):24-28.
- [3] 刘艳婷.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探析及其比较分析[J].消费导刊,2007(7):58-59.
- [4] 丁纪岗.经济周期理论发展脉络与经典学说回顾[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6):105-106.
- [5] 翟志成.经济周期理论与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走势[J].经济学家,2001(2):14-18.
- [6] 陈黎明.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关系实证分析——基于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4):37-42.
- [7] 郭庆旺,贾俊雪,杨运杰.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特点及其拐点识别分析[J].财贸经济,2007(6):11-17.
- [8] 施发启.中国经济周期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0(7):59-62.
- [9] 孙振,张永正,王小利.1999—2008年我国经济周期的状态划分及其拐点识别[J].统计与决策,2009(1):105-107.
- [10] 贾俊雪.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 [11] 刘朝阳.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及其对我国的适用性[J].南方金融,2005(2):28-29.
- [12] 宁晓青.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述评[J].财经理论与实践,1996(1):61-65.
- [13] 简泽.技术冲击,资本积累与经济波动[J].统计研究,2005(11):73-78.
- [14] 王于栋,杨昊晰.中国三次通货膨胀:周期划分与因素检验[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6(5):1-5.
- [15] 刘金全,刘兆波.我国货币政策作用非对称性和波动性的实证检验[J].管理科学学报,2003(6):35-40.
- [16] 张勇.论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反应的不确定性[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5):59-62.
- [17] 潘石.中国通货紧缩与经济周期波动[J].税务与经济,2000(4):41-45.
- [18] 周慧玲.经济周期与通货膨胀[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2):83-88.
- [19] 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分析[J].世界经济,2004(4):3-11.

(责任编辑 X 校对 Z)

(上接第11页)

- [32] Welsch H.Environment and happiness:Valuation of air pollution using life satisfaction data[J].Ecological Economics,2006,58(4):801-813.
- [33] 邢占军.主观幸福感研究:对幸福的实证探索[J].理论学刊,2002(5):57-60.
- [34] 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的编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3,12(6):703-705.
- [35] 黄立清,邢占军.国外有关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2005(3):29-33.
- [36] 辛自强,池丽萍.快乐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J].心理学报,2001,33(5):442-447.
- [37] 池丽萍,辛自强.幸福感:认知与情感成分的不同影响因素[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2(2):27-32.
- [38] 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J].心理动态,2000,8(4):23-28.

- [39] 陈惠雄.幸福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 [40] 傅红春,罗文英.上海居民收入满足度的测定与分析[J].管理世界,2004(11):62-67.
- [41] 赵奉军.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济学考察[J].财经研究,2004,30(5):75-84.
- [42] 曾飞,黄维德.收入与幸福关系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6,20(7):154-158.
- [43] 程国栋,徐中民,徐进祥.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J].地理学报,2005,60(6):883-893.
- [44] 李卫平.2008北京奥运会与北京市市民幸福指数关系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2):161-163.
- [45] 张明军,孙美平,姚晓军.兰州市居民幸福感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0,24(10):36-43.

(责任编辑 L 校对 Q)